

前 言

本书的标题《观念的冒险》有两层意思，两者都与本书的主题相合。一层意思是：某些观念在加速人类通往文明的缓慢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便是人类历史中观念的冒险。另一层意思则是：作者在构建可以解释历史冒险经历的一个思辨的观念体系时，他所经历的冒险。

事实上，本书研究的是文明的概念，力图要理解的是文明化的人是如何产生的。我自始至终强调的一个观点便是：要提高和保持文明，冒险是很重要的。

我的三本著作——《科学与近代世界》、《过程与实在》以及《观念的冒险》——都力图要表达一种理解事物性质的方式，都力图要指出那种方式是如何通过对人类经验种种变化的研究从而得到阐释的。每本著作都可分开来读，但是它们之间则是相互补充、相互生发的。

我看待这一历史题目的普遍方法主要受到了以下作品的影响：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纽曼主教的《论基督教教义的演变》，保罗·萨阿尔皮的《特伦托会议全史》，亨利·奥斯本·泰勒的《中世纪思想史》，莱斯利·斯蒂芬的《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以及各种不同的著名书信集。至于说到文学，我斗胆向那些对英国思想的早期发展感兴趣并对优秀文学感兴趣的读者推荐伊丽莎白和詹姆斯时期牧师们的布道文。还有亨利·奥斯本·泰勒的又一本书——《十六世纪思想及其表现》，该书描述了这两个时期的种种思想倾向及反倾向。20世纪，就其业已发展的状况而言，与前面所说的欧洲历史上的两个时期有类似之处，这既表现在思想的冲突方面，也表现在政治利益的冲突方面。

本书第二部分是讨论宇宙论的，其中我不断引用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1928 年出版的两本书：爱丁堡大学 A.E. 泰勒教授的《柏拉图〈蒂迈欧篇〉评注》以及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导师西里尔·贝利博士的《希腊的原子学家与伊壁鸠鲁》。

本书的某些部分曾被用来应酬我有幸收到的一些邀请。第一、二、三、七、八诸章的主要材料曾于 1929—1930 年期间在布林莫尔学院四次用于玛丽·弗莱克斯纳讲座，这些章节迄今尚未发表过。同样，第九章《科学与哲学》——也未曾发表过——曾于 1932 年 3 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文理学院用于戴维斯哲学讲座。第六章《预察》曾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讲演过，后应院长 W.B. 唐罕之请，作为他的《失控的商业》一书的序言，于 1931 年由纽约麦克格罗－希尔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第十一章《客体与主体》也于 1931 年在纽黑文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作为会长致辞讲演过，并于那以后发表于 1932 年的《哲学评论》第六十一卷，朗曼－格林出版社纽约版。

1926 年我在新罕布什尔的达特茅斯学院所作的一些未经发表的演讲当时已体现出本书题旨的雏形。这些演讲讨论了成功的文明所需的两种层次的概念，即特殊的低级普遍概念以及哲理的高级普遍概念。人们要求用前种水平的概念去收获那种直接获得的文明之果；后一种概念则用来指导通往新奇的冒险，并确保那理想目标的价值得以直接实现。

我十分感激我的妻子，她对本书讨论的问题提出过许多根本性的意见，并对各章历次手稿的修改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A.N. 怀特海

1932 年 9 月于哈佛大学

献 给

茱莉娅·伊沙姆·泰勒及亨利·奥斯本·泰勒
在他们温暖的友情中，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第一部分

社会学的观念

第一章

P.3

导 言

1

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本书的标题——《观念的冒险》——可看成是《人类历史》的同义语，因为它涉及林林总总的人类精神经验。但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标题所表明的，是人类经历的自身的历史，而人类森罗万象的历史是不可能全部描写下来的。

本书的自始至终，我都打算批判地思考观念在人类生活中所经历的那种历史，并打算借助于一些众所周知的事例来阐明我的论点。之所以选择某些特别的事例以作阐述，这一方面是由于我知识的或这或那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它们在我们现代生活中能引起普遍兴趣，以及它们的重要性。同样为了本书的目的，所用历史这一概念包括与过去相联系的现在和将来，以便它们能相互阐释并引起普遍兴趣。至于详尽的事实，我们则将依赖那一大批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他们的劳动在今天以及以往的三个世纪里施惠人类，致使人类对他们尊崇不已。

理论是建立在事实之上的；反之，以事实为基础的报道也贯穿着理论的阐释。直接的视觉观察要看到运动中的有色形状——“可疑的形状”——的影像。直接的听觉观察则要听到各种声音。但某位现场观察此类形状与声音的人，比方说一位外国宫廷的常驻公使吧，在阐述所谓“纯事实”时，却说：“他谒见了国务大臣，国务大臣颇为眷顾，

P.4 并十分清楚地解释了他将用以解决迫近危机的措施。”可见现场所观察到的事实即人对事实的现场阐释，它除了包括纯粹的感觉对象，同时还包括对预料的主观假设。

待到以后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来做选择时，他必然依据自己的理论标准来选择已往现场观察者所获的事实：他会批评已往的现场观察者，并对他当时观察到的事实作出自己的诠释。根据 19 世纪后期流行的历史学派的理论信条，我们就是如此得到“纯历史”的。历史学家们关于历史的这一概念，据说是避免了审美的偏见，也无须依赖形而上学的原则和宇宙论的结论。然而，这实则是想象的虚构之物。只有习染了偏见的头脑才会相信这一关于历史的概念——时代、种族、学术团体、某种兴趣倾向的偏见——这种充满偏见的头脑不能推测自身潜在的局限性。

历史学家在描述过去时，要依赖自己的判断来判别诸如是什么构成了人类生活中的价值这类问题。甚至当他将自己严格地局限于某一选定的领域时，无论是政治的或文化的，他仍然必须要判定是什么构成了该阶段人类经验的顶峰或低谷这类问题。举例来说，从人类的政治历史来看，黑格尔把他当时的普鲁士国家看成是该阶段人类经验的顶峰；一代人之后，麦考利^①则把他当时的英国立宪制度视为顶峰。可见，对思想和行动的判断都取决于这种隐蔽的前提。倘不依据某一判断标准、某一预期的目标，你便无法思考什么是聪明，什么是愚蠢，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堕落。这样的一些标准和目标，当其一旦广泛传播开来，便构成了人类历史上各种观念的驱动力。它们也指导着人们如何去叙述历史。

在思考观念史的过程中，我坚持认为，“纯知识”是一高度抽象的

① 麦考利 (T.B.Macaulay, 1800—1859)，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其代表作作为《英国史》。——译注

概念，应该从我们的头脑中清除出去，因为知识总是伴随着情感及目的等附件。同时我们也必须记住，观念的普遍性是有各种不同级别的区分的。因此，一个普遍观念是以各种不同的特殊形式出现于历史上的，这些形式是为不同种族的、不同文明阶段的种种特殊情况所决定的。P.5 较高级的普遍观念很少接受精确的语言表达形式。人们用适于相关时代的特殊形式来暗示它们。同样的，之所以有情感的伴随物，这部分地是由于人们在高级的普遍观念中朦胧地感受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部分地则是由于人们对观念所呈现的特殊形式有特殊兴趣。一些人激动于某面旗帜、某首国歌；另一些人激动则是由于朦胧地感觉到了他们的国家所代表的那种文明的形式。对于大多数的人，这两种情感来源是混合为一体的。

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讲述的是一个双重的故事。它讲述了罗马帝国在一千年间从衰落到消亡的过程。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帝国辉煌的顶峰，它的军事组织，它的省级行政管理，各种混杂的民族，两种宗教的勃兴与冲突，以及希腊哲学发展为基督教神学的过程。吉本在我们面前展示了士兵与政治家、哲学家与牧师的伟大与渺小，展示了芸芸众生的痛苦、英雄气概以及粗俗。他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幸福以及它所经受的恐怖。

但是在这部历史中，自始至终都是吉本在讲述。他便是他的时代的主导精神的化身。他的数卷历史正是以这种方式讲述了又一个故事。这些史册是 18 世纪精神的记载。它们既是一部罗马帝国的详细历史，又展示了近代欧洲文艺复兴这一白银时代的种种普遍观念。这一白银时代，正如七百年前与之对应的罗马时代一样，并没有意识到蒸汽和民主时代，即蛮族时代和基督教时代的对立物，立即要引起它的毁灭。就这样，吉本叙述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史，同时又通过这一例证预言了他自己所属的那类文化的衰亡。

整个观念的历史主要由两种因素组成。它们表现为近代的蒸汽和民主与古代文明中的蛮族和基督徒二者之间的比较。在它们各自的时代里，蒸汽和蛮族都是驱动它们各自的文明脱离传统秩序模式的无情感的力量（senseless agencies）。这些无情感的力量便是希腊哲学家有 P.6 时称之为“强制力”、有时称之为“暴力”的东西（可见于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也散见于一般文献中）。当这些力量以一种普遍相互协调的面貌出现时，希腊哲学家们便倾向于称它们为“强制力”；当其表现为一团杂乱无章的偶发事件时，则易于被称为“暴力”。历史的一项任务便是展示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各种强制力和各种暴力。另一方面，现代的民主，以及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都表明了那些来源于愿望又复归于愿望的明确信仰。它们的力量便是那些经深思熟虑的理想的力量，这些理想与保存并调整了种种现行社会制度的传统虔诚信仰相冲突。举例来说，我们发现亚历山大的圣克雷芒^①规劝同代的人躲避习俗。这些基督教的理想属于重铸它们各自时代的那些说服力量。

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明显过渡总是可以用蒸汽与民主的类比来描述，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用蛮族与基督徒的类比来描述。在驱使人类从他的旧锚地起航的过程中，无情感的诸种力量与深思熟虑的诸种愿望协调一致了。有时候，这种过渡时期是一个希望的时代，有时则是绝望的时代。当人类脱离了锚链，他或则致力于发现新世界，或则隐

① 圣克雷芒（Saint Clement of Alexandria, 150—211）：著名神学家，生于雅典。他杂糅了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信仰中的犹太传统思想，为基督教教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遭罗马皇帝塞维鲁斯迫害。——译注

隐听见前面碎浪击崖的声音而心头感到不安。罗马帝国的衰亡发生在一个拖得太长的绝望的时代；蒸汽和民主时代则属于希望的时代。

人们很容易夸大这两种过渡时代的区别。这完全取决于保留下来的文献记载。而这些记载到底表达了谁的感情呢？不管怎么说，甚至在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最糟糕的时期，蛮族人仍然自得其乐。对于匈奴王阿提拉（Attila）和他的游牧部落来说，侵入欧洲不失为一件快事，足以消除游牧生活的单调。但是我们也保存下了一些当初意大利哨兵的赞美诗。在夜色重重的冬夜当他们在北部的小镇沿墙踱步时，他们会发出突然的呼叫——“愿我主仁慈，使我等免遭匈奴蛮子蹂躏。”从此例中我们很容易分清，野蛮和文明是相互冲突的，而我们代表的是文明。我并不坚持认为我们现在对当时中亚的社会形态有什么了解，也并不坚持认为，意大利城市帕多瓦或阿奎莱亚城墙上的哨兵对匈奴人的想象是完全不合适的。 P.7

在每个明显过渡的时代，人们都在无声而被动地实践着一套正在过时的习惯和感情模式。与此同时，一整套新的习惯正在形成。在这两者之间，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混乱时期，或者是一个正在过去的危险期，或者是一个漫长的混乱期，其中夹杂着衰亡者的悲惨与新生生命的朝气。当我们估价这些力量时，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批评的立场。换言之，我们观念的历史来自我们对历史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观念的历史基于我们理智的立场。

人类并非全然无声地照习惯办事，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其他动物种类。尽管如此，在动物世界的历史上，人类的祖先也曾有过那样一些习惯模式的过渡时期，在那些期间，他们并未同时表现出理智的思考，既未表现出事先的目的，也未表现出事后的反省。举例来说，在远古时代，森林的繁茂生长促使一些哺乳动物上了树，变成类人猿；随后，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之后，森林的衰败又促使它们下树而变成了人类。

我们这儿描述的是历史无情感的一面。在这儿，历史的转换过渡或则受到雨、森林的影响，或则受到蛮族的影响，或则受到煤、蒸汽、电和石油的影响。尽管如此，甚至历史无情感的一面也不能简单地归于无情感这一专门范畴。雨、森林等不过是自然这一宏大秩序中的部件而已；阿提拉的游牧部落在某些方面自有其远胜衰落的罗马人的理智观点；而在煤和蒸汽的时代，一些特别的人物又在使用他们的智力影响该时代，促使该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过渡。但是，说到底，尽管有这些限制条件，雨、匈奴人以及蒸汽机总代表了原始的需要，正如希腊哲学家所构想的那样，这种原始的需要促使人类向前而根本不需任何理性地表达出来的目的观。类人猿变成人类，古代文明变成中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压倒文艺复兴，在这些过程中，人类零星的理智因素只是盲目地协调在一起而已，人类并不知道他们所干的事。

3

P.8 本书要集中讨论的是人类历史的一小部分，它涉及的是文明从近东到西欧的转移，其题旨只局限于两三个主要观念是如何成熟的；由于人类有效地运用了这两三个观念，文明便得以形成。我们将简略地追溯这些观念，追溯其自远东古代世界直至今日的地位。一种文明的界限是不确定的，无论是就其地理、时间还是基本特点而言。西欧的东部界限以及近东的界限尤其具有这种模糊的特色。随着几个世纪的流逝，这些界限也在起落变化。在其最后的辉煌时期，近东的界限延伸到了大西洋。但是在其辉煌的较早时期，也就是在希腊人时代之前，它从尼罗河流域延伸至美索不达米亚，从印度洋延伸至黑海和里海。它也深入到爱琴海流域，后来深入西地中海。但是，在我们此处的讨论中，近东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是现代欧洲的发祥地和背景而已。

本书的整个要点便是要表现西方文明中的那些因素，它们合成了文化史上的一个新成分。当然，任何新事物都不会是全新的。那些偶然出现的因素，或则是个人的梦想，或则是其他精神方式的微不足道的附属物，在后来的欧洲文明中却显现出新的重要性。问题在于，应该去了解重点是如何转移的，应该去辨识这一转移对西方世界的社会学所产生的诸种影响。这样，我们才可获得详细批判现代社会学发展所必需的思想先决条件。进而我们方可理解那些驱使人类世界前进的推动力的重要性。

在叙述文明从东方向西方的传播过程中时，以同样的理由，我们可将希伯来时期、希腊时期以及希腊化时期连同起来考虑。或则我们可以认为：近东思想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融入第一阶段的欧洲精神，其过程的发端正在这一时期。或则我们也可以认为：正是在这一时期，首批欧洲人接过了近东的思想火炬，并随后宣称了自己的精神独立。希伯来人和希腊人共同将一些观念介绍入欧洲以及最近阶段的近东，这些观念涉及普遍的人类以及作为个体的人的地位、一般性精神活动 P.9 中的某一规则及方向。这些观念结合起来开启了欧洲各种族进步的现代时期。有些社会学功能是来源于并复归于与人类这一种族相关的诸种观念，而本书第一部分主要讨论的便是这些社会学功能的最普遍方面。第二部分则是关于现代宇宙论的诸种原理，它们其实也是来源于希腊及希伯来思想。人类对这两类普遍观念中的任意一类的单纯兴趣，都会导致其获得新奇观点。

第二章

人的灵魂

1

在任何人类社会，都存在着一个浸透到人类活动的每一细节的基本观念。那就是对群体中个体成员（不涉及个人的特殊优点）地位的看法。当该社会进入了文明阶段后，社会成员相互之间都把对方视为独立的个体，各自有其喜怒哀乐，有自己的认识、希望、恐惧及目的。同时，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有着不同的理智认识能力，这表现为人们对事物细微特性的辨识力，对“正误”、“美丑”及“好坏”的不同判断。我们朦胧地过日子，轻松地接受有着如此经验的群体，并相信其他人也是以类似的方式生活着。

但是，在文明的早期阶段，这样的经验与信仰是理所当然的事。它们不会立即引起人们的思索，人们不会将这些经验和信仰单独挑选出来思考一番。因此，人们便不会修正将人作为人来估价的习惯。所以，社会的各色成员依不同情况或则相互爱护，或则相互损害、服从或驾驭。于是产生了公社似的组织，而且有了对它的各种信仰，这些信仰进而逐渐成为各种对它的解释。

我们将讨论文明进入了现代高峰后的几个时期。这个时期最多有三千年之久。在这个时期思想家业已出现。责任的概念出现了，而且人们也对它作出了某些定义。最重要的是，精神——即心灵——的概

念出现了。当其初露端倪时，这一重要概念被用作理解自然中纷纭万状难解事物的关键。照李顿·斯特雷奇^①的说法，自然最明显的两大特色便是自然的美（loveliness）和自然的力（power）。人类首先理解的是自然的力，其次才是自然的美。同时，在人类思想的最初阶段，自然的力被认为是自然的精神——即野蛮的、无情的但却又是宽厚的精神。在文明的所有阶段，大众崇拜的神代表的是部落生活较原始的野蛮性。对神的谴责正说明了宗教的进步。偶像崇拜的基调便是对流行神祇的满意之情。

在人类生活中，激发起人正当的不满之情的因素是一种渐次成熟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的基础便是对美、对理智分辨力以及对责任的看重。道德的成分则来自经验中的其他因素。因为倘不如此，责任便没有发挥作用的对象内容了。不可能存在处于真空中的单纯道德。所以，经验中的原始因素首先是动物情感，诸如爱、同情、愤怒等，并伴随着类似的渴求和满足；其次，才是更具人类特色的对美、对精微思想的经验，对它们有意识的享受。此处，理智分辨力，或者说精微的思想，是一个较“真实”——这是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常被引用的概念——意义稍广泛些的概念。人们在思想进行精细的调整时，其成就是壮观的。这种壮观与真实与否这一生硬的问题是不相关的。我们可以把这种壮观称为“美”。但是，理智的美，虽然可以用与感官美有关的词汇来赞颂，但无论如何，却要借助比喻来表现。对于道德美，也可作如是观。可能在实际中实现的那种最高理想的满足，包含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美。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美统称为那样一种美：它使宇宙的爱欲得到最终的满足。

① 参见《书与人》(Books and Characters) 中《布莱克的诗》一章。[李顿·斯特雷奇 (Lytton Strachey, 1880—1932)：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其代表作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译注]

对于欧洲思想来说，有效表达这种批判性的不满之情的方式——这可是文明的讨厌牛虻呀——是由希伯来和希腊思想提供的。就文字的精微性及对各有关问题的定义而言，人们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能找到对这一批判性不满的最充分的表达。我们在其中看到，柏拉图对诗人惯常信奉的神祇进行了批判——他真恨不得将所有的诗人都放逐了——同时我们也发现他分析了人的灵魂中潜在的各种能力。柏拉图宗教的基础是建立在“上帝可能是什么”这一观念的基础上的，其中对永恒美的种种形式也有关注；他的社会学则来源于他的“人可能是什么”的观念；人具有一种性质，倘要全面描述这一性质，就必须使用适用于描述神的性质的那些术语。希伯来人和希腊人共同提供了一个表达不满的方式。但是他们不满的价值却在于他们那一刻也不放松的、追求完美的希望。

2

讨论那些对各个时代进行修正的理智力量便是本书特有的主题。当我们考查这些理智力量时，我们发现可以将它们粗略地分成两大类型：一类是普遍观念，另一类是高度专门化的概念。前者包括诸种高度普遍化的观念，它们表现了事物的性质、人类社会的各种可能性、指导个人行为的终极目标等这样一些概念。在因重大活动而各具特色的每一时代里，我们都能在其顶峰以及导向顶峰的各种作用之中发现某一深刻的宇宙观，它不知不觉地被人暗中接受，在现行的各种行为动机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这一根本的宇宙论只是部分地得到了表达，要表达其细节则会派生出各种相互剧烈冲突的专门问题。一个时代的理智冲突主要关涉后者，即那些次级普遍化的种种问题。这类问题掩盖了人们对基本原理的共识。那些基本原理明白得几乎

不用表达，普遍得几乎不能表达。在每一个时期，思想的各种形式都有一个普遍形式。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这个普遍形式是半透明的，无所不在，且似乎是不可躲避的，乃至我们要做极大的努力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

为了找到一个能清楚表达此说的例子，我们必须脱离最抽象的普遍观念而下降到特殊的事例。在政治理论的领域里，且想一想古代地中海文明中各种纷纭的歧见。想一下伯里克利和克里昂、柏拉图和亚历山大大帝、马略和苏拉、西塞罗和恺撒之间的分歧。尽管如此，他们都同意一个根本观点，该观点是一切政治理论的基础。在整个希腊文明和希腊化的罗马文明中——也就是被我们称为“古典的”文明——人人普遍认为，需要一大批奴隶来从事那些不值得烦劳充分文明化的人去干的服务工作。换言之，在那个时代，一个文明的社会不能是自立的，在其社会结构中不得不织入一个相对野蛮的基层，以便维持文明化的上层。一个复杂的城市文明需要一个奴隶制的基础，这个认识在当时是如此的普及，无论在实践中或是在潜在的预想中，乃至我们可能认为，这一认识基于某个有充分根据的理由，这一理由出自那些有利于早期文明生活形成的种种条件。埃及人需要砖，所以他们捕捉希伯来人服役。关于造通天塔时上帝使人们语言纷杂一事，历史上的事实恐怕与残存的传说不合——它至少有力地说明了，当时像机器一样营造城市的奴隶是由多种族混杂而成的。 P.13

说到古代的政治派别斗争，迄今为止什么也未得到解决。柏拉图当时所讨论的每一个问题今天仍然存在。然而，古代和现代的政治理论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因为，我们不同意古人一致接受的前提。奴隶制是古代政治理论家的预设前提，自由则是当今政治理论家的预设前提。过去，思想敏锐的人发现，要把他们奴隶制的